

在撕裂与缝合之间

——李太贤长篇小说《谁与安居》的审美向度与精神旨归

□ 董泽永

灰暗里的光亮：
世俗裂隙中的温热叙事

《谁与安居》的现实书写，最可贵的特质在于拒绝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，以灰度视角呈现生活本真，在层层撕开世俗灰暗与生存病灶的同时，始终坚守光亮的叙事底色，让破碎的现实保有修复的可能。小说以锦城梦苑这一城市高端别墅区为叙事切口，打破大众对“豪宅安居、精英无忧”的固有想象，剖开都市精英圈层的精神荒芜，完成对当代世俗生活的深度撕裂。作为核心叙事人物，吴非如半生被物质匮乏的童年记忆裹挟，拥挤逼仄的居住环境、父母终日争吵的家庭氛围、姐妹反目的情感创伤，构成其人生底色的灰暗印记。步入中年、生活安稳后，她将毕生的安全感寄托于别墅豪宅，执着于炒股置业、追逐物质圆满，试图以外在居所的奢华弥补内心长久的缺憾，最终落得身心劳损、病痛缠身，尽显普通人在世俗执念中的无奈与困顿。其丈夫季费贤的人生轨迹，更是一代文人精神困境的真实缩影：昔日心怀赤诚、笔墨铮铮、风骨凛然的青年作家，在世俗功利的裹挟下，因商业传记写作陷入创作失语与理想坍塌，数年难出精品，昔日文人意气消磨殆尽，转而以玩世不恭、油腔滑调掩饰内心的荒芜与不甘，在理想与现实的撕裂中茫然徘徊。

但小说并未止步于揭露与批判，而是在满目灰暗的现实裂隙中，始终播种温暖与光亮，让苦难有回响、迷茫有归途、破碎有修复。老龚夫妇的描写，是全篇最动人的现实微光。二人半生拾荒为生、清贫度日，收养孤女、艰难度世，却始终坚守骨气与尊严，屡次婉拒外界资助，以勤劳立身，以善良待人、以清白传家。与此同时，小说铺展诸多正向叙事：吴非如在执念中自省，褪去虚荣、宽恕过往，热心邻里、温柔处世；季费贤在迷茫中觉醒，挣脱功利枷锁，回望乡土、重拾笔墨初心；圈层乱象之下，更多普通人坚守善良、敬畏生活、真诚处世。灰暗是时代的常态，光亮是人性的选择，正是这份“于灰暗处生微光”的叙事，让小说的现实书写兼具批判力度与人文温度。

隐秘处的真诚：
欲望褶皱里的本真坚守

这部作品的人物塑造，始终遵循“缺憾不掩本心、欲望不遮真诚”的审美逻辑，让人性的躁动、迷茫、软弱与私心，都扎根于真实的生活境遇，于隐秘的欲望褶皱之中，彰显人性本真的善良与赤诚。季费贤的人性挣扎，是小说人性书写的核心范本。中年后的季费贤看似散漫随性、玩

优秀的现实主义文学，总是善于在生活的常态肌理中剖开时代的隐疾，于世俗的烟火褶皱里打捞人性的微光。长篇小说《谁与安居》读后，让我觉得像刚刚站在无影灯下观摩了一台手术：医生把患者看似好端端的某处剖开，看到了其中隐秘的病灶，随后又实施相应的切除和缝合。作家李太贤便是这位医生，他用笔剖开别墅光鲜的表层，再用显微镜照见内里，透视关联的外界。卡尔维诺曾说：“世界只有在被破坏了之后才完美。”我认为，这里的“撕裂”或“剖开”便是“破坏”之一种，而“缝合”和“呵护”，则是通向“完美”的手段。从美学意义上讲，《谁与安居》让我们在其“撕裂”与“缝合”之间，感受到了一种不完美的美以及不同层面美的指向。

世不恭，褪去了青年时期的深沉内敛与文人锐气，甚至在孤寂迷茫中被世俗情欲裹挟，对神秘女子易妙心生悸动，陷入精神迷途，暴露出中年人性的软弱、躁动与侥幸。但剥开其看似颓废、油滑的外在表象，其内心深处的人文风骨与真诚底色从未磨灭。面对商业名利诱惑，他始终坚守创作底线，拒绝为流量与金钱妥协，不愿篡改真实、神化人物，宁肯断绝合作、舍弃高薪，也不肯出卖文人初心；面对世俗包装、商业变现的捷径，他淡然拒绝，始终将文学创作当作精神归宿而非牟利工具；面对家庭，他深知妻子半生辛劳，执念深重，包容其虚荣与较真，心怀愧疚与责任；面对故土，他常怀感恩赤诚，晚年倾力投身乡土文旅建设，以笔墨与行动回馈桑梓。外在的松弛与躁动是岁月打磨的生存姿态，内在的风骨、责任与纯粹，是其人性最隐秘、最珍贵的真诚。

小说一次次要人物的塑造，亦印证了“人性隐秘处自有真诚”的审美内核。游走灰色地带、擅长投机钻营的尤仕将，虽满身市侩、精于算计，却并非彻头彻尾的功利小人，历经浮沉后幡然醒悟，洗尽铅华、重情重义，守住为人处世的底线；被贴上“依附、卑微”标签的易妙，看似身世飘零、处境尴尬，实则心怀苦楚、身不由己，始终向往光明、渴望正当人生，在困顿中坚守本心、向阳而生；年少偏执、为爱迷茫、半生漂泊的吴非是，历经人生起落与岁月淬炼，放下爱恨纠葛，回归故土、潜心科研，以学识报国、以温柔处世，完成自我救赎与人性升华。纵观全篇，没有绝对的恶人，只有被时代裹挟、被命运捉弄、被欲望牵绊的普通人。所有人性的幽暗与缺憾都是生活常态，而藏于心底的善良、赤诚与向善之力，是人性永不熄灭的底色。

带着伤痕与体温的书写

——周如钢中短篇小说集《从深夜开始的凌晨》读记

□ 张 亮

读完周如钢的中短篇小说集《从深夜开始的凌晨》，给人最直接的感受是疼痛，有一种压抑感，但读完又会有有一种清奇的清醒——仿佛有人在你最困顿的深夜，轻轻推开了窗，让你看见那些与你同样醒着的人。这部收录了七篇作品的小说集，以冷峻而诗意的笔触，将当代人尤其是中年男性的精神困境推到了聚光灯下。七篇作品，无一例外，都刻画了现实中的小人物，在职场、婚姻中苦苦挣扎。周如钢的写作之所以值得郑重讨论，不在于他写了困境，而在于他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处理困境，那就是他拒绝简单的心灵鸡汤，拒绝给出廉价的希望。这似乎像是在深夜里的飞蛾，默默地寻求温暖自己的一团火。这种“不直接治愈的治愈”方式，构成了这部小说集最核心的叙事伦理。

卡佛曾说：“我希望我的故事能抓住读者，让他们参与进来。如果幸运，读完最后几行，他们会静静坐一会儿，想想刚读过的东西，也许心灵能往前挪一点点。”这种试图抵达人心的努力，也体现在周如钢的小说中。

周如钢找到了一套将无形精神困境转化为具象感官意象的书写策略。脑袋里年终呼啸的风（《赶风》），眼脸上反复生长的红色花苞（《眼螨》），后脑勺上悬而未决的锤子（《夹竹桃》），公园里昆虫啃食花瓣的声音（《从深夜开始的凌晨》）……这些意象化的书写在他的作品里不是装饰性的修辞，而是人物精神状态的具体呈现。这种书写的妙处在于，它让不可言说的精神创伤获得了可以被触摸的形状。比如《夹竹桃》里，被裁员、妻子出轨、身体受伤等等，这些打击没有直接出现在叙事的前景，而是全部转化成了那柄

悬在头顶的锤子。在这里，锤子俨然已不仅仅是象征，它就在那里，每天都在敲。作者所记录的，正是深夜里人们与自我、与生活的对峙。

《赶风》和《眼螨》两篇的主人公，都在试图对抗精神困境。《赶风》里的人物最先的行为是依附风、追逐风，深陷在远方的风带来的痛苦里，在经历自身的多重挣扎与撕裂后，逐渐由向外追寻转向向内安放，带着伤痕继续活着。《眼螨》则是以眼疾为叙事起点，却不断通过闪回和联想将叙事引向不同的时间层面——一见义勇为的现场，医院的诊疗室、家庭中的沉默、与好友牛仔的往事等等，这些碎片彼此交织，如同眼脸上反复发作的炎症，一层层肿胀、扩散。读者不是在读一个简单的故事，而是在经历一种症状的蔓延。周如钢将叙事节奏控制得极为精准。每一次闪回都像极了我们的眨眼，显得那么短暂、突然，却又带着更深层的隐痛。

《桃花源记》里有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影子，也有胡安·鲁尔福笔下科马拉村的影子。周如钢将这古典名篇进行了大胆的现代改写。桃花源不再是避世的仙境，而成了一个阴阳转换、生死交织的异质空间。作品里的主人公源子在“自私”与“大爱”之间反复摇摆，最终他把还阳的机会让给了别人，自己则成了走出桃花源后无法转世的孤魂。这个设定瓦解了传统桃花源叙事的乌托邦色彩，代之以一种更复杂也更残酷的追问：生者与死者，谁更艰难？周如钢要揭示的是，个体在这个世界的真实心魄，恰是现实世界的热闹想要掩盖的那部分。所以，桃花源里没有净土，只有人性试炼的延续——这与周如钢被采访中的回答形成呼应：

审视中的鼓舞人心：
执念解构后的精神安居

《谁与安居》的价值，不在于揭露现实病灶、展示人性复杂，而在于通过彻底的自我审视与现实反思，解构世俗的安居误区，重构精神的安居内核，在层层撕裂与深度反观之后，给出治愈人心、启迪时代的正向愿景，让整部小说在现实批判之外，拥有温暖持久的精神力量。

小说深刻解构了当代人根深蒂固的物质安居执念。在世俗认知中，豪宅华居、财富地位、光鲜体面，是人生圆满、身心安稳的终极象征。吴非如毕生追逐别墅安居，将居所的奢华等同于人生的圆满，为追逐物质圆满耗费半生心力、透支身心健康；锦城梦苑的一众精英，穷尽财力、人脉与心力追逐浮华虚名，试图以物质丰盈填补人生缺憾。但小说以真实的叙事给出答案：所有外在的物质堆砌，终究无法抵御内心的荒芜与精神的迷茫。坐拥豪宅的精英群体，或家庭失和、人心疏离，或初心失守、终日焦虑，或深陷欲望、自我内耗，无人因物质富足获得真正的安宁与幸福。物质可以安放肉身，却永远无法安顿灵魂，这是小说对当代世俗生存最深刻的审视与反思。

在解构世俗执念的基础上，小说完成了精神愿景的重构与人心创伤的温柔缝合，为当代人的生存困境提供了清晰的救赎路径。通过全员人物的自我觉醒与成长蜕变，小说层层递进阐释“安居”的真正内涵：真正的安居，从来不是居所的奢华、财富的累积、身份的光鲜，而是内心的澄澈安宁、人性的纯粹坦荡、家庭的温情和睦、人际的温暖相守。季费贤挣脱情欲躁动与名利枷锁，跳出浮躁的精英圈层，扎根乡土，深耕笔墨，在纯粹的精神创作中安放自我；吴非如放下虚荣执念与过往恩怨，与生活和解、与自我和解，在烟火日常与邻里温情中收获安稳；尤仕将摒弃投机钻营，坚守本心、真诚处世；易妙斩断灰暗过往，奔赴新生；老龚夫妇淡泊自持，坚守本心，于朴素日常中守住岁月安稳。个体与自我和解、与过往和解，与生活和解，构成了个体安居的核心底色。

当然，作品在“撕裂与缝合”的艺术空间里也还存在些许的不足，比如，吴非如与季费贤日常调侃、幽默的尺度略显失真，部分戏谑化表达脱离人物年龄与身份设定，削弱了现实质感；季费贤与易妙的情感纠葛、出轨行为缺乏充分的心理与情境铺垫，人物行为逻辑略显仓促突兀，且最终出轨有损人物形象的“亮度”；小说结尾借季费贤之口，将“谁与安居”直接定义为“现实之问、时代之问”，表达过于直白浅露，削弱了作品应有的含蓄蕴藉与留白张力。但尽管如此，也并不影响《谁与安居》作为优秀长篇小说的品质，因为，它以“撕裂与缝合”为核心叙事逻辑，最终构建了层次丰富、意蕴深远的现实主义审美体系。

“世上又哪来的净土，若真有净土，一定也是残存在少数人的灵魂里。”

《暗夜》讲述的是底层人生沉重艰辛的生存境遇。父亲庄守城是进城务工的普通人，背负着无人知晓的生活重压，选择鱼场杀生也好，选择在医院搬运尸体也好，担心不被儿子理解，只能选择用谎言包裹事实，这对父子亲情也是一种无声的消耗。年少的儿子看不懂父亲谎言背后的苦衷，体会不到底层生活的沉重内核，体现出两代人的认知隔阂。最终父子在一场大车祸后彼此接纳、完成和解，尖锐的误解与疏离终究归于质朴温情的日常。《我们的朋友》是一个非常温暖的故事。小说中写道：“至少你可以相信这个世界，即使是再冷的冬天，仍然有暖和的地方。”正是小说人物给予他者的温情，治愈了那些深夜难熬的时光。

细读周如钢的小说，我发现，他的小说世界里，人物从来不是扁平的符号，每一个人物，几乎都是带着伤痕与体温的“活生生的人”。他写小人物的困境，从来不是居高临下的怜悯，而是俯身贴近，把自己的呼吸、心跳，都融进人物的命运里。那些被生活鞭打得无所适从的人，没有被简化成寻常小说里的悲剧人物。他们只是在深夜里，笨拙地伸出手，想抓住一点微光。作者不回避人性的复杂与幽暗，却也始终不肯放弃对善意的书写——那些藏在市井角落、底层缝隙里的细碎暖意，不是惊天动地的救赎，却是支撑人物走下去的全部底气。他笔下的“梯子”，从来不是凭空出现的奇迹，而是人物自己在困境里，靠着那一点不肯熄灭的念想，一钉一铆搭起来的。这是周如钢的温柔，也是他的清醒：他知道深渊有多黑，却依然愿意为每一个被命运捉弄的人留一盏灯。

古典诗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璀璨瑰宝，承载着创作者的情志与体悟。近日细读杜波先生的《浣花诗文》，深有所得。先生自号浣花溪居士、杜陵野少，久居成都浣花溪畔，追慕诗圣杜甫文脉。全书收录三百余篇古诗体诗词等，将蜀地风物、家国襟怀、人生体悟熔于一炉。杜波先生深耕古典格律，兼融今人情思，或藏情于物或直抒胸臆，更善曲直交织，以一卷《浣花诗文》展现含蓄美、直白美与曲直相生的诗境。

含蓄之美：
意在言外，耐人寻味

含蓄，是诗词“藏”的艺术，是东方美学的独特韵味。它借助物象、景物、典故等载体，将情感与哲思藏于文字背后，追求“言有尽而意无穷”的审美效果，让读者在品读中细细揣摩。这不是浅尝辄止的直白倾诉，而是深植于心的余韵流转。

古典诗词中，含蓄之美比比皆是，杜甫《登高》中的名句尤为动人：“无边落木萧萧下，不尽长江滚滚来。”彼时杜甫漂泊西南，身世飘零，满心沧桑与悲苦，却未着一字写“愁”“苦”，只是描绘了落叶萧萧、江水滚滚的萧瑟秋景。那飘落的秋叶，是岁月的流逝，是身世的浮沉；那奔腾的江水，是命运的无常，是家国的忧思。一切情感与感慨，都藏在这壮阔而悲凉的景致之中。

《浣花诗文》中诸多咏蜀地山水，尽得含蓄传神之妙。先生追和杜甫绝句《和诗圣绝句四首》（其一）写道：“溪东垂柳映柴门，岸北繁花绕水村。菊绽愿邀诗圣赏，月升思与古人论。”全诗通篇写景，垂柳柴门是草堂旧景，秋菊邀赏、望月论诗，将跨越千年的思古幽情尽数藏于花木月色之间。先生半生深耕基层，辗转达州、巴中山川，后居锦城浣花溪畔，胸中常怀对先贤文脉的敬畏，只借浣花溪寻常风物托寄情志。读者品读山水草木，便能读懂文字背后修身立业的哲思，不言理而理自现，不抒情而情自深，完美诠释“意在言外”的独特韵味。

直白之美：
直抒胸臆，掷地有声

与含蓄之美相对，直白之美是诗词“露”的艺术，它摒弃迂回曲折，以明朗简洁的语言直陈情感，读来明快有力。直白并非浅俗粗陋，而是将最真挚的情感以最直接的方式剖白而出，字句铿锵顿挫，自带刚劲利落的力量，使人心生共鸣。

古典诗词中，直白之美的标杆当数文天祥《过零丁洋》：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？留取丹心照汗青。”身陷绝境以反问直剖生死气节，带有千钧之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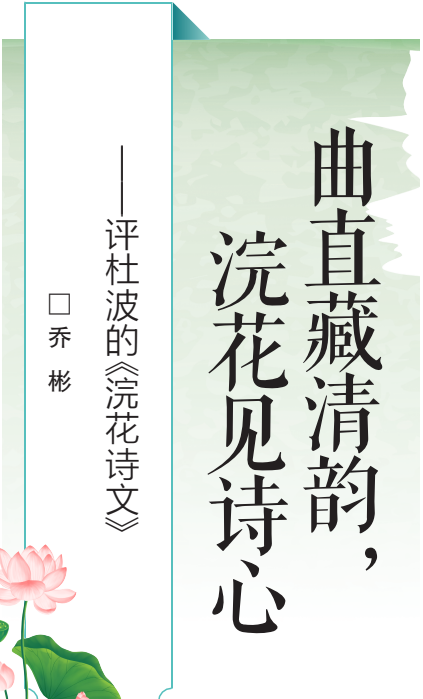
先生在卫健部门工作多年，文集收录数首写白衣医者、基层百姓的诗作，亦是直白抒怀的范例。“成城众志驱虎豹，敢取鬼门夺命还。”不借风雨、草木烘托悲愤，直接称颂医者逆行担当，家国大爱不加掩饰，直白质朴，慷慨动人。这类直白笔墨，把心底赤诚坦荡铺展纸上，自有掷地有声、直击人心的力量，与含蓄托物之作形成审美互补。

曲直相生：
含蓄与直白相融，方为至境

诗词的最高之妙，不在于纯曲，亦不在于纯白，而在于曲直相生。含蓄与直白并非对立两端，而是相互补充的两种表达，既有含蓄的留白余韵，又有直白的精神力量，达成“直中含曲、曲中有直”的境界。

杜甫的《春夜喜雨》是曲直相融的范本：“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”，以“好”字直白倾泻欣喜；后句“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”转入含蓄写景。直白起笔，含蓄收束，刚柔兼融，意蕴绵长。杜波先生以杜甫为精神宗师，《浣花诗文》诸多代表作，皆娴熟驾驭曲直相融的笔法，兼具含蓄意境与直白真情。

其长篇歌行五言体《诗圣饮酒歌》最能体现曲直相生之妙，全篇为致敬杜甫而作。这篇诗以酒为线索，串联起诗圣跌宕起伏的一生，融史料、诗情、家国、风骨于一体，文辞酣畅，气韵悠长，既是对杜甫诗酒情缘的深度



解读，也是对中华千年诗酒文化的深情礼赞。

先生的题记旁征博引，清晰地梳理出杜甫与酒相伴一生的轨迹。世人皆知李白“一饮三百杯”的豪迈，却少有人留意杜甫“径须相就饮一斗”的洒脱；或知晓杜甫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，却忽略他少年“性豪业嗜酒，嫉恶怀刚肠”的磊落性情。

通篇长歌行承汉乐府歌行体之神韵，一韵到底，叙事与抒情浑然相融。全诗以时间为脉络，从杜甫年少成名、翰墨驰场写起，开篇“子美少思壮，风雅翰墨场。性豪喜杜康，嫉恶怀刚肠”，勾勒出少年杜甫意气风发的形象。彼时的他酣饮纵怀，眼界开阔，漫游齐赵，踏遍咸阳，一杯美酒，盛满少年意气与凌云之志。及至长安，一曲《饮中八仙歌》名扬京华，与李白诗酒相交，盛唐文人的风雅与旷达，尽在杯盏之间。诗人用笔凝练，将杜甫青年时期的快意人生铺展画卷，字句间朗朗上口，颇有盛唐诗歌的昂扬气象。

安史之乱的鼓角，击碎了盛世繁华，也扭转了杜甫的人生轨迹。诗作笔锋一转，从长安盛景转入乱世飘零：“惊落手中觥，渔阳鼙鼓响。飘零何惶惶，成都搭草堂。”昔日宴饮欢歌不复存在，颠沛流离成为生活常态。客居蜀地的岁月，作者细数蜀地佳酿，射洪美酒、郫筒玉液、剑南春酒……将巴蜀大地的酒韵风物一一铺陈，地名、酒名相映成趣。“众醉君独醒，忧国叹兴亡”一句，堪称全诗点睛之笔。酒是遣兴之物，更是杜甫排遣家国之忧的载体，染上了沉郁厚重的家国情怀。

酒与诗，是杜甫一生不可分割的两面。酒滋养诗情，诗寄托心志。少年时，酒是豪情，催发少年意气；盛世间，酒是风雅，缔结知己情谊；乱世中，酒是慰藉，消解漂泊孤苦；暮年时，酒是长叹，诉尽家国悲愁。杜甫的酒，扎根于大地，浸透着民生疾苦与家国大义。杜波先生这首长歌行，挖掘出杜甫诗酒情怀背后的精神内核，他纵欲狂歌，却从未忘却初心；他借酒遣怀，却始终心怀天下。酒酣之时，他有“孔丘盗跖俱尘埃”的旷达超脱；酒醒之后，他仍是心忧黎民、志在社稷的诗圣。

诗至结尾，“笔落惊风雨，豪饮留华章”“千间广厦旁，一樽酹忠良”，升华全篇主旨。千年岁月流转，浣花溪畔的茅屋依旧，杜甫的诗篇万古流传，而他杯中的风骨、心中的忠魂，亦随着酒香代代相传。作者以一杯清酒祭奠先贤，以一首长歌行追慕诗圣，既是对杜甫诗酒人生的致敬，也是对中华诗酒文化的传承。

浣花藏曲直，诗心续千年。通览杜波先生《浣花诗文》三百余篇作品，其含蓄之美，如浣花溪畔深谷幽兰，暗香浮动，余味悠长；直白之美，如草堂门前利剑出鞘，锋芒毕露，掷地有声；而曲直相生，则如溪山相依、刚柔相济，方为诗词的至高境界。

品读《浣花诗文》，不必厚含蓄而薄直白，亦不可重直白而轻蕴藉。读懂先生笔下浣花溪的草木藏情，读懂他诗句里坦荡赤诚的直抒胸臆，在曲直虚实之间，接续浣花溪千年诗脉，传承中华诗词不朽的精神血脉。